

大连国有文艺院团以改革整合资源 激发内生动力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本报记者 戴春光 高爽

核心提示

2018年1月,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大连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组建。大连话剧团、大连歌舞团、大连杂技团成为这家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一部分。这也是三家大连市属国有文艺院团继几年前完成事业单位转企的身份转换后,再次经受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洗礼。

改革的结果如何?有作品为证:话剧《无风地带》荣获2020年辽宁省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扶持作品;杂技剧《流星》获2019年法国明日杂技节金奖。也有数据为证:集团组建前,歌舞团和杂技团每年只有微利,话剧团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三个院团全部赢利,利润总额达1000多万元。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实现的,有何样本意义?



话剧《把一切献给党》正在排练中。



杂技主题晚会《旗帜》正在排练中。



话剧《无风地带》剧照。

1 夯实阵地,做艺术创作生产的引领者推动者

5月7日,记者走进三家大连国有文艺院团排练现场:

大连话剧团正在深度打磨话剧《无风地带》,在省内外展演之后,还将在6月5日、6日到国家大剧院进行两场商演;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正在排练新作《把一切献给党》,讲述的是中国“保尔·柯察金”吴运铎以坚强与忠诚书写传奇人生的故事,也是庆祝建党百年的倾情之作。

大连歌舞团的音乐舞蹈情景剧《摇篮》的舞蹈动作已经编排完成,作品深情回顾在党的领导下大连的建设与发展;大连杂技团主题晚会《旗帜》也进入最后的排练阶段,年轻演员们将用杂技语汇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峥嵘岁月,两部作品将参加在全省和大连市举行的庆祝建党百年文艺作品展演。

成立于1952年的大连杂技团享誉中外,曾在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和摩纳哥国际杂技大赛等世界顶级杂技赛事中摘金夺银。大连话剧团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旅大文工团,多次获中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同样脱胎于旅大文工团的大连歌舞团创作出《革命人》《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花鼓舞》等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声乐、器乐和舞蹈节目。

回顾辉煌的历史和当下的创作,从三个院团团长的言谈中能明显感受到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歌舞团团长雷恒大说:“我们去请知名导演耿军执导我们团的庆祝建党百年献礼作品,当他听说著名的《摇篮曲》出自大连歌舞团时,马上就来了灵感,节目因此定名为《摇篮》。”

回想起几年前经营的困难,几名团长也有很多话想说:办公条件简陋、缺少排练场地、经费不足、高水平人才流失……杂技团团长杨剑胜说:“培养一名杂技演员要从几岁开始,可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容易被民营院团以高薪挖走。”话剧团团长于伟说:“大连话剧团排演的《雷雨》,颇受资深话剧

迷认可,但人才队伍老化,我从二十几岁开始演四凤,到了50多岁还在演。”

最为重要的就是院团从事业单位转换为国有企业身份,却多年沿袭着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不少演职人员面对市场有些茫然无措。而这正是新组建的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要完成的任务——让已经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摆脱困境,在直面市场中蹚出一条新路。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生在集团成立之前,已经有多年企业经营经验,他所领导的大连新华书店系统一直是全国的样板,对三家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他有一套有别于以往企业经营战略。王延生说,虽然院团已经转制,但从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来看,它们仍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是艺

术创作生产的引领者、推动者。集团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资源整合,在院团中逐步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激发文化企业的内生动力。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内部管理制度、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探索企业年金制度、保证高质量人才和青年人才优先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很快在院团内部推行,演职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大连杂技团排练厅中心高高的旗杆上,38岁的杂技演员沙冰双手紧紧攀住旗杆,旋转身体做出各种高难度杂技动作,以此表现革命战士的勇气和力量。作为团里的主力,为什么会选择一直留在大连?沙冰说这是因为“故土难离”,但无疑也有收入提高这个因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舞台、有优秀作品。



音乐舞蹈情景剧《摇篮》正在排练中。

2 深度融合,实现院团、剧场、人才资源整合

位于大连中山广场的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是一座始建于1951年的俄式老建筑,是当时国内最为先进和时尚的剧场之一。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是大连市政文化活动中心,但是经历了70年的风雨,它显得小了、旧了,风光不再。

2018年,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正式归属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集团投资近300万元完成了大剧场安全隐患改造工作,对音乐厅、戏剧厅进行了全面升级。全新升级的人民文化俱乐部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唤起了很多大连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走进剧场,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各种演出信息、舞台剧照彰显着演出市场的繁荣。室内装修既保留了大跨度圆形穹顶及欧式雕花舞台的原始风貌,又增添了书吧、书吧等配套服务设施。

王延生说,这次剧场改造,不仅解决了剧场自身经营的问题,而且为院团提供了演出阵地,有效缓解了院团缺少自主剧场、演出成本高的压力,剧场与院团在宣传推广、票务营销等方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既活跃了演出市场,又让优秀剧目传得开、留得住。

这正是新组建的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所在——通过集团统一调配资源,充分实现集团内各文化企业资源、平台的共享和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2019年,集团所属专业院团联合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追梦》,其间,参与演出的大连京剧院近30名演职人员因一些特殊情况缺席,集团迅速反应,抽调杂技团人员补充阵容,在最短时间内衔接剧组排练进度,确保《追梦》演出圆满成功。

在2019年开展的200余场“送戏下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公益惠民演出中,集团遴选优秀节目,组合推出大量综合场演出,广受观众欢迎。以往“大连某某团”的单一形象,变成了“大连专业艺术”的新名片,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加。

王延生对于深度融合的理解是:融合不是把所有的东西揉碎了放在一起。首先要尊重院团的创作自由,让专

业人员放手去做专业的事,在艺术创作上各个院团相对独立。集团要做的是提供服务,对内帮助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解决剧团创作中遇到的资金、场地问题;对外,做好院团之间、剧团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以及剧团与市场之间的衔接。

一件小事值得一提:2018年,大连话剧团准备创作话剧《无风地带》,缺少创作资金,集团第一时间帮助解决,但是注明是借款。为什么是借而不是给?王延生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院团建立起造血机制,而不是对集团形成新的依赖。结果是一年后,话剧团赢利,不仅还了借款,还把《无风地带》打造成市场、口碑双丰收的艺术精品。

采访过程中,陪同采访的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月坤一直电话不断,有院团的资料要汇总上报、有项目申报,还有院团要拍摄演出照、制作宣传海报……管月坤说:“这些院团并不擅长的事,都由集团的专业运营团队帮助他们来完成。”

3 吃透政策,破解改革难点问题

在大连市杂技团主题晚会《旗帜》排练现场,有一个高空垂直的钢架,演员们将在上面再现当年长征中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情景。团长杨剑胜感慨:这是整个主题晚会《旗帜》的最大亮点,关乎整个节目的成败。多亏了去年市政府对杂技团排练厅的修缮,原来的排练厅棚顶早已老化,这样重量的钢架之前是无论如何不敢安装的。

这项维修工程只是大连市解决文艺院团缺少排练演出阵地等一系列工程中的一环。2020年,大连市政府领导对几家文艺院团进行专题调研,针对这一问题督办推进。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困扰大连杂技团多年的排练厅安全隐患问题彻底解决;解决了大连艺术剧场被其他单位占用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将周边违建进行了拆除,为下一步维修改造奠定了基础;协调搬迁大连歌舞团、大连话剧团所在的艺术大厦内专业以外其他单位,为院团丰富经营内容、增强市场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姜薇由此总结:大连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平稳过渡,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记者从大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工作,近年来力度不断加大。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多次到文化产业集团和所属院团进行专题调研,为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出实招、解难题,在资金扶持保障力度上不断提高。对转企国有文艺院团调整改革运营经费,将已执行15年之久的每年人均4万元运营经费提高到6万元;大型剧目创作资助由160万元/台提高至260万元/台,并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给予配套资助;提高公益演出补贴场次和标准,将年补贴150场、每场1.7万元,提高至年补贴190场、每场2.5万元。

王延生说,这些举措缓解了困扰院团多年的改革困境,让院团切实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与厚爱,使院团轻装上阵,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王延生的办公桌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国家和省市关于国企改革、深化文艺院团改革的政策文件,文件上圈圈点点,显然已被反复研读。王延生说:国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为院团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支持,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政策,才能获得改革的红利,保障院团平稳顺利改革。

(本文图片由大连话剧团、大连歌舞团、大连杂技团提供)

黑丁笔下“九月的沈阳”

高翔

最早知道黑丁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读书期间收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时,得知他青少年时代有“闯关东”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回到家乡青岛,与萧军、萧红、舒群等人相识,共同投身抗日文学创作活动,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黑丁辗转到达上海,接续了在青岛的创作活动,并和鲁迅取得联系,在他的指导和推荐下,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生路》,显示了与“东北作家群”极为相似的生活路线与创作轨迹。其《九月的沈阳》是现代中国书写沈阳作品中的独特之作,收入《光明》第一卷第七号附录的《东北作家近作集》一书中,1936年9月出版。曾有学者将《东北作家近作集》的书名视为“东北作家群”命名的渊源之一,如此看来,将黑丁归为“东北作家”之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题材比较,《九月的沈阳》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对城市反侵略战争的书写,民族武装斗争图景的描绘之作,以记载“值得纪念的一段伟大的事件”,表达活跃在辽沈地区抗日武装的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气质。作者开篇对沈阳城9月战前景致的铺陈,是独具匠心的。“浑河的水,平稳地流着。沿岸的郊野展开了一片丰盛的碧绿的彩色,高粱,树林,草,和野花,在微风里摇摇摆摆地活跃着。”然而到了“如火一般的八月”“沈阳的古老城头,犹如涂上一层黑墨,却高高的矗立着”“这城市是愁闷了,懦弱的灰影笼罩着它的周边,渐渐地它像一个老人失去了生命的健康”“苦难的人们终日在无家的蔽天的茂林里转动,转动”;不仅有敌伪以“治安”为由发布的“离城三十公里以内”“高粱限期一律收割”的严令,而且“四城的边门外”周围掘出“一条连接的深阔的沟壕”,两岸“又是满装着从密的电网,侵略者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交互地一齐向外推去”,展现着沈阳社会沉重的殖民况味和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画面。

作者所述“九月的沈阳”,实际是“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一个凄凉的雨夜”抗日武装巷战的素描,呈现着现代北方城市战争的惨烈场景:“大南关起着应击的无休止机关枪声,大炮冲着无边的黑暗轰然地叫鸣。”“大南边门外的电网是被折断了。”“街市的灯光熄灭了。大西关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往外吐着奔跳的汽车……一辆一辆地开足马力,没有制止地用着迅速的步伐,直朝着大西边门那条大街奔跳。钻出大西边门外去,再转过马路湾,于是,拉着吼声,一辆一辆地便消失在日本站”。战斗持续进行中,“小河沿也起着剧烈的枪声了。万泉园,黄土坑,大东边门外,沿着兵工厂一左一右全充满了肉搏的声音。”“东塔,冲天的火光映照了九月的沈阳,那是‘广大的飞机场与十几架飞机’被焚毁”。读《九月的沈阳》,使人惊讶出生于山东即墨乡村的作者对沈阳的熟悉。其实,这与黑丁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他1914年在原籍出生不久,父亲就为生活所迫,离家独闯东北,落脚吉林磐石,在一家油碾厂打工。及至上世纪20年代末,黑丁也迫于生存,随父来到磐石,在一家杂货铺当学徒。黑丁在《我的自传》中写道:到东北后,父亲患病在身,“他再三表示无力供我读书,我处于绝望之中,只好四处求援,终于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留在沈阳,考取以张学良为董事长的同泽学校文科三年级,并高中毕业了。”“九一八”事变时,黑丁正在沈阳同泽中学读书。“事变那天深夜,黑丁在炮火中随着难民群逃入北满的大森林”,经过艰难奔波,才幸免于难回到父亲务工的磐石县。“可见,黑丁对沈阳城市的熟知,源于其切身的生活经历。当然,《九月的沈阳》之主旨,是对抗日武装在沈阳发动的反侵略战争的礼赞,对日伪军队肆意杀戮的真切揭露。有意思的是,作者一度并未直接记叙抗日武装痛击日伪军的战斗场面,而是用标带引号的‘友军’称谓日伪武装,并由这一叙事视角生发开去,以对日伪军的直书径描,轻盈而间接地侧面表现着抗日武装在战斗中的机敏灵活,用兵的神奇莫测,激情中蕴含着从容与悠然,充满了那撤下之风和戏谑之美。

这项维修工程只是大连市解决文艺院团缺少排练演出阵地等一系列工程中的一环。2020年,大连市政府领导对几家文艺院团进行专题调研,针对这一问题督办推进。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困扰大连杂技团多年的排练厅安全隐患问题彻底解决;解决了大连艺术剧场被其他单位占用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将周边违建进行了拆除,为下一步维修改造奠定了基础;协调搬迁大连歌舞团、大连话剧团所在的艺术大厦内专业以外其他单位,为院团丰富经营内容、增强市场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友军”的枪炮杂乱地响着。但外边每当放过一次枪,便是一阵过度的沉默,这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再就不会轻易把一粒子弹扫射出去。有时,“啪”一声,可随着这声音,人影镇静地带着熟练的姿势却很快地移向别的地方去了。及至“友军”蜂拥追上来,映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空虚的黑暗在紧紧地包围着。不是胜利。没有俘虏,也没有战利品。

……

左边,右边,前边,那枪弹像鬼出神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友军”,有的就如同疲累得要歇息一般地仆倒在地上。

天黑得厉害,雨没有一点儿停止的意思。每一个“友军”的眼睛里,却始终看不见一个向他射击的人影。只能听着粗野的喊声混在雨滴里打抖:

——沈阳的民众,不愿做奴隶一齐起来!

作者对抗日武装战士,又有精彩的描绘:三名战士蹲在“一道矮的土墙顶上”,其中一人举枪瞄准,“痛快地放了一枪”,那“友军”士兵“猛地把自己一歪斜,一点没有声息地横卧在树下”“流弹飞过了他们的面前,‘友军’又迫近深巷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惧怕的想象,火燃烧着他们的心,他们雄壮地站立着依靠在门楼子的角隅上。他们的枪机饿了”;与敌人展开近战,“枪声呜咽,一片刺刀的交流,猛烈地刺着”;当“伪警察队长被一架机关枪掩护着,站在一个墙角上大声”叫喊时,“一种按捺不住的情绪刺痛了”两名抗日战士的心,他们“像两只咆哮的野兽,一个朝着警察局长扑去,一个用手枪在那个把持着一架机关枪的士兵的后脑上一扫,那士兵应声便倒在机关枪旁边……”而后,他们“把持着新从敌人手里得来的一架机关枪”“勇敢地向前突击着”。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抗日斗士何等无畏的风采。

作品对沈阳城内伪军、伪警的书写,具有特殊的意义。东北抗日武装较早关注到对日伪军的争取与瓦解。活跃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少年铁血军,便将“唤醒伪国军”作为铁血军战斗口号之一。义勇军将领赵同年在《东北义勇军》中写道:“伪军亦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不得已,且常援助义勇军,吾等为增加抗日力量,减少敌人力量,决定与他们接近。”基于这种认识,赵同还创作了诗歌《唤醒伪国军歌》。这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制定的对待伪军政策是一致的:“对于伪军,估计其士兵与下级军官是被迫而去投日军,应以民族利益的立场,去瓦解和争取,组织暴动以响应我军进攻。”这在《九月的沈阳》中有相应的表述。

在作品的结尾,作者以欢畅、灵动的笔触,展示着抗日武装“唤醒伪国军”的成果:“在黎明之前,红袖队排着行列,脱离了铁的羁绊,唱着进行曲,伟壮地向大野奔去。”作者自注:伪军于芷山部“因为袖子上有两道红条,所以人家都叫他们红袖队”。

《九月的沈阳》在题材选择、叙事结构、情节设计和艺术格调调谐方面,都有独特的表现;那种认为黑丁的作品缺乏娱乐性的指责,是对黑丁也是对时代的误解。黑丁的创作无伪饰,不做作,奔着华,尚本色,显定力,呈现出朴素与本真之美,是值得文学史家重视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经黑生前精心保存、粗略整理、逝世后出版的《于黑丁选集》(共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却未收《九月的沈阳》一文,或许是作者担心作品中某些略显晦涩的叙事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如今,《九月的沈阳》问世已85年,一代文学家黑丁逝世也整20年,人们不必揣度他在文集中不选此作的缘由,但见《九月的沈阳》今天依然放射出生命的光彩。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此文为该项目成果节选。)